

#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关系演变： 现实路径与理论逻辑\*

王琳 马艳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概括和提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的核心特征及本质规律，应聚焦经济关系的演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关系的多元化、复杂化和虚拟化转变，分配关系的多样化、市场化和分享化转变，交换关系的扩大化、网状化和数字化转变，消费关系的层次化、差异化和共享化转变，推动着我国从传统的计划型经济关系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且近年来逐步呈现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诸多新的特质。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这一现实演变，可以进一步得出其理论逻辑，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维度的有机交融作用推动着经济关系的横向演变，经济力与经济关系的动态耦合作用推动着经济关系的纵向演变，“以人民为中心”则是其一以贯之的内在轴心。我国经济关系的改革实践不仅是对马克思关于“四环节”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对运动”等理论的现实佐证，同时也是对这些理论与时俱进的拓展和中国化的创新。

**【关键词】** 改革开放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作者简介：**王琳（1989-），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师资博士后（上海 200433）；马艳（1956-），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7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8%上升到15.2%，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sup>①</sup>。但与丰富的改革实践相比，对这些实践过程的经验总结及理论化梳理仍远远不够。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这就对我国经济学者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务。

在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的关键转折期，系统梳理、深入剖析我

\* 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中国积累社会结构理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创新研究”（17AJL002）的阶段成果。

①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8年12月19日。

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经验，继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和发展提供基础，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此，即不能面面俱到，将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的经济改革实践全部复述一遍；也不能以偏概全，孤立地探讨某一方面的改革实践经验，而必须找到一个最能概括和彰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变化核心特征及本质规律的分析思路。

本文认为，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总结和提炼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实践，应聚焦经济关系的变化。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结成的各种经济利益关系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即点明其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sup>①</sup>，且历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始终为之努力的目标也正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行规律，同时探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可能形式。另一方面，经济关系是社会经济形态和经济结构的集中体现，其变化特征和规律是对一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最佳刻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大会上所强调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实际上就是“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sup>②</sup>的过程。且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也明确提出，“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sup>③</sup>，其中经济制度便是经济关系的法律化体现。为此，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经验，系统梳理和提炼我国经济关系的变革路径和演变机理，显得尤为重要。

经济关系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其中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构成经济关系的四个基本维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第一部分便分析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之间的关系，且不同于“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体”这一被马克思称为“肤浅的联系”的三段论法，马克思强调四个环节并不是各自割裂，而是“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sup>④</sup>。具体而言，生产具有决定性作用，决定着“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sup>⑤</sup>，同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四个环节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基于马克思的上述逻辑，我们可以将经济关系视为一个“系统”，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即是这个“系统”中的四个子系统。就系统内部而言，四个子系统之间、每个子系统与总系统之间均有着密切的相互促进和相互依存关系，遗漏任何一个子系统都无法实现对整个系统的科学剖析；就系统外部而言，分析一个系统还必须考虑其所处的环境，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对于系统的演变也有重要作用，对于经济关系系统来说，其环境主要就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将经济关系视为一个“系统”，能够避免对我国经济改革实践经验进行“割裂化”或“罗列式”总结的情况，保证了分析的完整性、科学性和动态性，是梳理和提炼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良好视角。但从现有研究来看，尚未有从这一视角的深入分析，尽管部分学者已将马克思的“四环节”理论应用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sup>⑥</sup>、经济新常态<sup>⑦</sup>等现实问题的分析，但仍缺乏基于长期视角和系统论思想的历史演变分析和理论机理探讨，这就为本文留下了可拓展的空间。

为此，本文旨在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关系系统的现实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页。

②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8年5月5日。

③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8年12月19日。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页。

⑥ 徐永平：《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考——马克思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理论的启示》，《理论研究》2011年第5期。

⑦ 逢锦聚：《马克思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的原理及其在经济新常态下的现实意义》，《经济学家》2016年第2期。

演变路径及内在演变机理进行深入分析。首先，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维度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关系的现实演变特征；其次，将现实演变与理论逻辑相结合，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次剖析我国经济关系演变的理论机理；最后，提出推动我国经济关系良性演变的对策建议。这一分析不仅能较为全面和科学地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中最本质、最核心层面的变化，同时也更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的研究思路，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关系的现实演变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所发生的最直观的变化，便是由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转变不仅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同时也伴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系统性变革，这些变革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形态和经济结构变化的全面刻画，也是我国经济改革实践的集中体现。为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关系的现实演变历程，本文从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四个维度出发探索其核心演变特征，继而得出我国经济关系的总体演变路径。

### 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关系的演变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产能力呈现跨越式提升，且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各种关系，如劳动者与资本的关系、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劳动者与机器结合方式等，也均发生显著变化。要深刻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关系<sup>①</sup>的现实演变，必须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对运动中进行分析，为此我们从生产力水平、生产力均衡性、生产力发展趋势三个视角出发，分别考察我国生产关系向多元化、复杂化、虚拟化的演变。

一是生产关系的多元化。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极其落后的生产力以及各种物质资源的极度匮乏，我国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对于当时国民经济恢复和现代工业体系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这种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已经表现出对生产力发展的明显束缚，为此我国生产关系的变革首先从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开始。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承认了个体经济的合法性，到1988年将私营经济的合法性写入宪法，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至1992年我国工业中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占比已达到13%，多元的所有制结构逐步形成。1992年以后，我国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继而先后通过“抓大放小”“国退民进”等政策，积极推动个体、私营、外资、混合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巩固。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生产过程中人和人的社会关系，所有制结构变化不仅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我国生产关系演变的本质特征。

二是生产关系的复杂化。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激发了经济主体的活力，但同时也带来了生产力发展的不均衡问题，使得我国的生产关系，尤其是劳动关系不断复杂化。1978年以前，我国仅存在单纯的劳动关系，即劳动者之间仅存在城乡差异、不同国有企业之间差异等人民内部矛盾，而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劳资阶级矛盾。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均出现了多种类型的分化，从资方来看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个体资本、私营资本、外资、混合所有制资本等多种形式，从劳方来看也逐步出现了国有企业中有编制的劳动者、国有企业中合同制的劳动者、

<sup>①</sup> 这部分研究所聚焦的是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非广义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外资企业劳动者、农民工、私营企业劳动者等多种类型。在这种条件下，劳资双方之间、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均存在多种可能性，且其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距不断拉大，利益纠葛和冲突更加复杂。数据显示，1992—2008年期间，我国劳动人事仲裁受理案件数增加了85倍，涉案的劳动者当事人数量增加了70.84倍<sup>①</sup>。但2012年以来，我国劳资争议案件数量及涉案劳动者数量相比以往均呈现相对较低的水平且具有一定下降趋势，这又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劳动关系开始呈现出和谐化的大趋向。作为“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sup>②</sup>，劳动关系从“单一”到“复杂”再到“和谐倾向”的变化过程，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关系演变的核心特征。

三是生产关系的虚拟化。所有制结构、劳动关系等变革使得我国的生产关系从改革开放前的“桎梏形式”转变为“发展形式”，极大地解放和推动了我国生产能力和生产技术的发展。而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我国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转变，逐步呈现出“虚拟化”特征。一方面，由于网络平台的快速发展，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雇佣关系不再拘泥于“一对一”的固定联系，依托网络平台而建立起的虚拟的、流动的、交叠的雇佣关系正不断扩大其规模；另一方面，网络信息技术催生出了虚拟企业、虚拟市场、虚拟金融等虚拟经济体，其生产场所、生产工具、生产对象均具有虚拟化特征。这就意味着，在互联网技术日益普及的条件下，各经济主体之间的联系更加间接化、虚拟化，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选择隐藏于互联网平台的背后，劳资双方的直接矛盾随之减弱，但与此同时也呈现出劳资矛盾转化为社会矛盾的趋势。

## 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配关系的演变特征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动态演变，我国的分配关系也发生了多维度的变革，经历了收入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和分配具体实现形式的市场化，并呈现出收入分配模式的分享化趋势，由此演绎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分配关系的动态演变。

一是分配关系的多样化。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对非公有经济的逐步放开，我国的分配方式也经历了从“平均主义”到“按劳分配”再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转变。具体而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打破了平均主义分配方式；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要实施“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政策，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承认了除劳动之外其他要素参与分配的合法性；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分配制度，继而正式推动形成了我国分配关系的多样化格局。近年来，在坚持分配关系多样化发展的条件下，我国开始更加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党的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一新表述；党的十九大更是强调“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这意味着我国未来收入分配制度将更加向按劳分配倾斜。

二是分配关系的市场化。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逐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分配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也随之从“计划统筹”转变为“市场配置”。一方面，尽管按劳分配是我国当前分配关系中的主体，但不同于马克思在设想未来社会时所提到的按劳分配，目前我国实施的是市场型按劳分配，即劳动者先以货币工资的形式获取劳动报酬，再通过商品市场实现其个人消费，为此须遵

<sup>①</sup> 1992—1995年的数据来源于1993—1996年历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6—2008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6》，<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wgk/szrs/tongjijianjian/>。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63页。

循市场机制、价值规律的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资本、技术、管理、土地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具体形式则更加依托于市场配置方式，生产要素所有者依据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发挥的贡献，通过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获得相应的报酬。分配关系具体实现形式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极大地激发了各经济主体的活力，也提升了各类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分配关系演变的重要特征。

三是分配关系的分享化。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应用，使得我国的分配关系呈现出新的变化，即分享型分配关系逐步出现并不断扩大。一方面，互联网空间本身便是一个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商品，即同意互联网协议的用户均可平等使用互联网空间，且一人对互联网空间的使用不仅不会减少其他人的收益，反而会由于提升了互联网的延伸性和效率性而增加整体收益，为此分享是互联网时代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互联网所具有的超强复制性，使得信息、技术、知识等无形要素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广泛参与分配关系之中，且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新技术，正在逐步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继而推动分配的合理化和科学化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分享型分配关系的演变提供了技术基础。

### 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换关系的演变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以及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我国经济的交换能力也呈现跨越式升级，不仅交换数量大幅增长，交换质量也不断提升。与此同时，我国在交换关系方面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一是交换关系的扩大化。改革开放以前由中央统筹安排的小范围交换关系，在经历“市场作为计划的补充”“价格双轨制”“价格闯关”“改革和完善市场价格体制”等一系列改革之后，已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规模化交换关系。从数据来看，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978年到2016年增长了212倍，平均年增速达到15%左右<sup>①</sup>。且随着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这一规模化交换关系不仅局限于区域或国内市场，更是将世界市场纳入其中。197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仅有355亿元人民币，这一数据到1992年已上涨为9120亿元，增加了24倍，到2016年这一数据相比1992年再次增长了近26倍<sup>②</sup>，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此外，作为流通领域中的特殊部门，金融行业也在1984年以后通过明确中央银行职能、推动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等措施进行了分层次的市场化改革，实现了资金交换关系的扩大化发展。

二是交换关系的网状化。在改革开放以前单一的公有制结构下，我国的交换主体也相对单一，主要表现为公有制企业与消费者之间、不同公有制企业之间或城乡之间的交换。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结构的变革，我国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等各种流通领域中的交换主体均更加多样化，促使交换主体之间逐步形成了相互交织的立体网状交换关系。在产品市场上，私有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类主体均成为产品的供给者，这在增加了交换活动竞争性的同时也为交换关系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在要素市场上，各类企业之间均产生不同的交换需求，企业和劳动力之间的交换过程也更具复杂性。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我国劳资的交换开始更多以智力劳动和虚拟资本的形式呈现出来，开启了交换关系多元发展的新趋势。交换关系的这种网状化转变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换关系演变的重要特征。

三是交换关系的数字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我国产品、要素、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基于历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计算整理得到。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基于历年进出口贸易总额数据计算整理得到。

资金等交换活动的载体均呈现出数字化的趋势。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已逐步推动纸币向虚拟电子货币转变,使得产品交换的媒介逐步数字化;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也促使产品交换渠道逐步数字化。从数据来看,自2014年国家统计局首发网上零售额数据至2017年,仅四年时间这一数据已从27898亿元增长到71751亿元,增加了157%<sup>①</sup>。伴随着交换媒介和渠道的数字化,交换主体在交换活动中所结成的关系也呈现出虚拟化特征,即交换主体隐于互联网平台之下,交换双方在时间、空间上的联系均更加间接化;交换主体之间的交换过程主要通过程序来引导和推进,互动更加智能化等。

#### 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关系的演变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大幅度提升,全国居民消费能力也实现巨大突破。从数据来看,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已从1978年的38.3%,上升为2016年的66.5%<sup>②</sup>。在消费能力大幅提升的同时,我国的消费关系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一是消费关系的层次化。伴随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呈现出由“基本温饱需求”到“高层次物质需求和基本精神需求”再到“美好生活需求和高层次精神需求”的转变,继而使得消费关系也发生了层次化演变。这种变化一方面体现为,我国居民对食品类基本生存品的消费比重已显著下降,1978—2017年期间,我国农村和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从67.7%和57.5%下降至31.2%和28.6%<sup>③</sup>。另一方面则体现为,我国居民对教育、文化、旅游、医疗等更高层次的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呈现出更快的增长,数据显示,1980—2012年期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长率达14.49%,比这一时期农村人均消费支出的总体增长率高出2.37%;这一变化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则更为显著,仅2013—2016年四年之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支出便增长了32.7%,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增长了43.6%,而这一时期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总增长率则仅为24.8%<sup>④</sup>。消费关系的层次化演变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关系演变的核心特征。

二是消费关系的差异化。改革开放以前,在“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居民消费普遍短缺且均等化。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的多元化和市场化转变,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但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也使得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拉大,继而带来了我国居民消费关系的差异化发展。从城乡消费差距来看,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这一数据在经历1978—1985年的小幅下降后,始终处于在波动中不断上升的趋势<sup>⑤</sup>;与此同时,城镇内部不同收入群组之间的消费差异也在不断扩大,以2002—2012年这一时间段为例,十年间我国城镇居民最高收入(10%)与最低收入(10%)家庭人均现金消费支出之比从3.78上涨到5.16<sup>⑥</sup>。但近年来,随着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和贯彻实施,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消费差异已开始呈现出一定的缩小趋势。

三是消费关系的共享化。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带来了消费模式的重大革新,主要表

① 2014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统计》2015年第3期。2017年的数据来源于人民网,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18/0118/c1004-29773384.html>。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

③ 1978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2017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 基于历年城镇及农村居民人均医疗、文教娱乐等消费支出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⑤ 朱诗娥、杨汝岱:《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评论》2012年第1期。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 基于2002—2012年按收入等级分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消费支出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 消费关系的跨期性发展。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下，信用服务日趋多样化、个性化，且伴随着普惠金融、社区金融等金融制度创新，信用服务的覆盖群体不断加大，推动着以信用为支撑的跨期消费逐步成为我国居民消费的重要方式之一。(2) 消费关系的共享性趋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数量多则价格优惠多的价格歧视现象是较为常见的，但其规模常常受到单个消费者消费数量的局限性。然而，信息技术革新和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打破了不同消费者之间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使得消费者可以通过组织大规模集体消费行为而共享消费优惠，近年来出现的共享单车、团购、拼单等新型消费形式均符合这一特征。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四个维度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四个维度的变化既有各自的特征，又显示出极强的相互联系，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结构及发展趋势是贯穿于四个维度演变共同主线，推动着我国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型经济关系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型经济关系。而近年来，我国生产关系的和谐化趋势、分配关系的分享化趋势、交换关系的数字化趋势、消费关系的共享化趋势等特征正进一步彰显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诸多新的特质。

###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关系演变的理论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维度所体现的变化特征，以及由这四个维度所构成的经济关系的总体演变特征，均证明了我国经济关系的演变遵循着马克思关于“四环节”有机体系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对运动的基本规律，但又进一步创新和拓展了马克思的这一经典逻辑。厘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关系演变的内在机理，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的发展，同时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有益探索。

#### 1. 我国经济关系演变的横向逻辑

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关系演变的现实梳理，不难发现，我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遵循着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运行四环节”的经典逻辑，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且“一定的生产决定着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sup>①</sup>。

一方面，生产关系的演变决定着我国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的变化特征和未来趋势。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经济关系的演变过程和演变特征来看，生产关系的演变的确对于其他经济关系的变化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尤其是所有制结构的变革。改革开放以前“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结构，就决定了分配关系必然是均等化分配或单一的按劳分配，交换关系是较为简单的计划型交换，消费关系则是均等化、短缺型消费。而随着改革开放我国所有制逐步转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多元结构，其相对应的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也更加复杂和多样，且所有制结构改革在引入私有资本、外资等多元资本的同时也必然引入市场型资源配置方式，继而推动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的市场化转变。

另一方面，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的变化发展也对我国生产关系的变革有着重要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包括积极作用，如每一次分配制度改革的推进，都会为经济主体提供直接的利益激励，继而加速所有制结构的改革进程；每一次对市场机制的推进和完善或国际市场的拓展，都会推动生产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页。

关系的市场化变革；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物质文化需求向美好生活需求的转变，则是拉动我国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动力。而当分配、交换、消费关系改革滞后或超前时，这种反作用则表现为阻碍作用，如当前分配制度不完善所导致的投机泛滥、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对于推进和谐劳动关系有一定的阻碍作用；改革开放初期流通领域所进行的“价格闯关”，由于过于激进和仓促，曾一度导致经济失控，反而阻碍了所有制结构的改革进程；我国居民消费观念滞后于改革开放进程，使得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始终远低于发达国家，这对于改革有一定抑制作用，等等。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关系的改革实践并没有止步于马克思关于“四环节”的经典理论，而是进一步创新和拓展了这一经典逻辑。其证明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维度之间不仅有着密切的相互作用，而且还构成了一个彼此交融的动态演变体系，四个维度之间的互动融合，是推动我国经济关系演变的直接动力。

第一，我国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维度的相互作用是多维交错的。不仅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之间有着作用和反作用，四个维度之间均有着密切、交错的相互作用。例如，分配制度改革直接影响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情况，收入的大幅提高极大地推动了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的结构性升级，但收入的不均衡则引致了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的差异化发展；我国流通领域的市场机制完善和国内外市场拓展，直接影响着消费关系的变革，同时也推动了市场型分配的逐步完善和发展；我国消费需求、消费能力的升级对于交换关系改革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激励。尽管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维度之间具有一定的决定和反作用关系，但从长期视角来看，四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是简单的线形结构，而是多维交织的网状结构。

第二，我国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维度的相互作用是动态交融的。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关系的演变来看，四个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多维交错，而且在这种交错作用中呈现从量变到质变的动态交融过程，即在四个维度的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四维度之间会出现相互融合，继而快速推动经济关系的整体演变。这种交融作用集中体现在1992—2008年和2012年至今这两个时间段。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继而开启了我国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金融市场改革、新农村改革等一系列经济关系改革，这些改革并不是单独针对四个维度中的某一方面，而是若干方面交融在一起的整体性变革，从而使得我国经济关系演变进入快速推进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在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的总体布局，这再次激发了各经济关系的交融式转变，开启了我国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加速转化过程。

可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关系的演变遵循并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四环节”的理论逻辑，这表明了，在经济关系从一种旧的稳定状态向一种新的稳定状态转变的过程中，通常是生产关系率先发生新的变革，继而激活分配、交换、消费关系不同程度的变化；四个维度之间存在动态、交错的相互促进，使得四个维度均逐步从旧状态转向新状态，在这一过程中，如若某一维度的变革出现滞后，则会阻碍其他维度的变革；当四个维度均在较大程度上实现向新状态的转变时，四个维度之间会形成多层次的交融，继而快速推动经济关系的整体性演变。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维度之间的有机交融作用，是推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关系演变的横向逻辑。

## 2. 我国经济关系演变的纵向逻辑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维度之间的有机交融刻画了我国经济关系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演变的实现路径，但要厘清这种演变的纵向逻辑，即演变的根本动力、必然性及演变方向，则必须



从更加宏观和长期的视角进行考察。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关系的总体演变路径，不难发现，这一演变遵循着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对运动”的基本规律，即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而生产关系发挥着重要的反作用。首先，生产力层面的发展决定着我国经济关系的基本演变方向。1978年以来我国实施制度变革的根本原因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之所以选择进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其实质就是为了满足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即在物质生产能力较低的情况下，需通过市场竞争来最大化激发经济主体的活力。在具体转变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也对经济关系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生产技术从“机械化”到“自动化”再到“智能化”的变化趋势，促使我国生产关系呈现虚拟化发展趋势，分配关系也随之呈现分享化趋势，交换关系呈现数字化转变，消费关系则呈现跨期性和共享性趋向。其次，生产关系层面的改革在我国经济关系演变中发挥着重要的先导作用。在技术的客观要求下，制度层面的变革成为我国经济关系演变的先动力，这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过程中有深刻体现。当计划经济体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时，我国通过渐进式制度改革实现了从“桎梏形式”到“发展形式”的转变。不论是市场化改革还是对外开放制度，均是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较低、物质资料匮乏的条件下作出的适应性变革，继而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制度创新，也均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求下进行的经济关系层面的创新。

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深入剖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关系的现实演变，可以发现，这一实践过程并不仅仅遵循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对运动”的经典理论，更是创新和发展了这一经典理论。具体而言，至少可归纳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力—经济关系”是研究社会经济变革的更为完整的分析框架。依据马克思的经典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对运动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其中所论及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很多场合也均为广义范畴，但由于马克思在具体分析时主要聚焦直接生产过程，故并未对广义范畴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进行系统阐述。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可以看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作为经济运行的四个基本环节，对于完整描述一个社会经济变革过程而言缺一不可，且四个维度均有着“力”和“关系”的范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分配力与分配关系、交换力与交换关系、消费力与消费关系之间均存在着相互作用。这就意味着，要更为完整和立体地呈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形态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应在由生产力、分配力、交换力、消费力构成的“经济力系统”，和由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构成的“经济关系系统”这一分析框架中予以考察。

第二，“经济力—经济关系”之间是相互耦合的作用关系。尽管经济关系的变化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技术进步的客观需要，但从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这一长期和宏观视角来看，两者确是如“鸡生蛋、蛋生鸡”一般的关系，无法僵化地认为，经济力发展为先，抑或经济关系变革为先。经济力与经济关系之间的“决定与反作用”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过程中已转变为一种耦合<sup>①</sup>作用关系。经济力与经济关系之间的相互耦合主要通过“利益”作为链接。一方面，经济力的提升需要利益来驱动，而这种利益驱动是否能够实现则很大程度取决于经济关系，如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在20世纪60年代末已无法为我国经济力发展提供足够的驱动力，限制了经济力发展；而改革开放

<sup>①</sup> 所谓“耦合”，是指两个事物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具有耦合关系的两个变量，无法通过单独考察其中一个而得到最终的作用结果。这里我们借用“耦合”的概念来描述经济力与经济关系之间的作用，是为了强调两者在作用于经济运动时并不是独立可分的，而是有机结合、共同发挥作用的。

则通过市场机制的引入为经济力提升的潜在利益实现提供了驱动力，继而推动了经济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关系的改革同样需要利益来驱动，且这种利益的实现也需要经济力予以支持和保障，如生态环保制度改革需要足够的新能源技术、清洁技术、净化技术作为支撑，否则则会由于成本过高而无法予以实施；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能降低制度改革成本，同时也能够对制度实施过程进行更有效的监督和管理，继而对经济关系改革进程有重要推进。经济力与经济关系之间这种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关系，使得两者必然以耦合的形式作用于经济运行过程。

第三，“经济力—经济关系”的相互耦合作用是动态演变的。经济力与经济关系的相互作用，并不是永远的“促进”和“加强”，而总是处在“促进”和“抑制”的动态变化过程中，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sup>①</sup>。当经济力和经济关系均能够为彼此的利益驱动提供足够的保障和支撑时，两者处于相互促进的适应状态，继而推动经济力和经济关系的进一步演变发展；但由于现有技术的局限性或制度创新主体的有限理性，经济力或经济关系的演变会出现放缓或停滞，导致经济力与经济关系逐步转变为相互抑制的不适应状态；唯有当技术出现突破性创新或者制度发生大规模变革时，两者才会转为弱适应的相对调整状态，并在这一调整过程中再次逐渐转为适应状态。经济力与经济关系这种“适应—不适应—相对调整—再次适应”的动态过程，是经济关系演变的根本动力。

以上三点刻画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关系演变的纵向逻辑，即我国经济关系是在与经济力之间的动态耦合作用中发生演变，伴随着经济力与经济关系之间“适应—不适应—相对调整—再次适应”的动态过程，经济关系从一种与旧的经济力系统相互适应的结构逐步转向另一个与新的经济力系统相互适应的结构，继而实现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力发展和经济关系升级的协同过程。具体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物质资源极度匮乏以及经济结构相对单一的条件下，我国生产力发展与计划经济体制之间形成了有效的相互促进，使得这一时期经济力与经济关系处于“适应”状态；但随着经济部门日益多样化，计划制订的科学性和有效执行不再能够保证，且“平均主义”和僵化的体制导致经济活动愈发低效或无效，这使得我国经济力与经济关系逐步转变为“不适应”状态；当这种不适应所带来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时，便推动了我国1978年以来的一系列大规模制度创新，促使我国经济力与经济关系转为“相对调整”状态；这种调整一方面取决于相对较低的经济力发展水平，即推动生产关系的多元化、分配关系的多样化、交换关系的扩大化以及消费关系的层次化，以激发经济主体的活力；另一方面则取决于相对不均衡的经济力发展结构，即在生产关系的复杂化、分配关系的市场化、交换关系的网状化以及消费关系的差异化演变过程中，不断调整我国经济的整体资源配置情况，继而促使经济力与经济关系不断走向“适应”状态；这种适应状态正是推动我国经济关系持续改革的根本动力，为此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也显示出生产关系的虚拟化、分配关系的分享化、交换关系的数字化、消费关系的共享化等新的发展趋势。

这里需要额外强调的一点是，除以上我国经济关系演变的横向和纵向逻辑外，我国的经济关系演变还有着一个一以贯之的内在轴心——“以人民为中心”。不论是经济力还是经济关系，不论是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还是消费关系，其发展和演变均以满足人民需求为最终目标，也即“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顺应民心、尊重民意、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1页。

关注民情、致力民生”<sup>①</sup>，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的必然要求。而正是因为这一内在轴心，使得我国经济力和经济关系变革的利益驱动之间出现了一个关联点和重要纽带，保证了我国能够较快实现经济力与经济关系之间的相对调整，继而极大延长了经济力与经济关系之间的相互促进过程。更是因为这一内在轴心，保障了我国经济关系演变的根本目标和方向，使得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关系演变的现实路径成为一种必然。这是我国经济关系演变逻辑得以成立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取得如此大的发展成就的重要“秘诀”之一。

#### 四、推动我国经济关系良性演变的对策建议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实践中所蕴含的规律和经验，对于中国进一步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同时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源泉。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聚焦社会经济运行的本质核心即经济关系的演变，一方面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维度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关系的现实演变特征及演变路径，另一方面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次深入剖析了我国经济关系演变的内在逻辑。经过研究，主要得出如下两方面结论。

其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即生产关系的多元化、复杂化和虚拟化转变，分配关系的多样化、市场化和分享化转变，交换关系的扩大化、网状化和数字化转变，消费关系的层次化、差异化和共享化转变。据此可归纳出我国经济关系演变的总体路径，即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型经济关系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且近年来已显示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诸多新的特质。

其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关系的演变蕴含着丰富的理论逻辑，其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维度之间的有机交融作用是其演变的横向逻辑，经济力和经济关系之间的动态耦合作用是其演变的纵向逻辑，“以人民为中心”则是其演变的内在轴心。我国经济关系的演变过程不仅是对马克思关于“四环节”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对运动”等经典理论的现实佐证，同时也是对这些经典理论的现时代创新和中国化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的转折时期，各种经济关系的演变仍面临诸多困境和挑战。在生产领域，当前正在积极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处于起步阶段，作用尚不明显，劳资冲突也在近年逐步转变为社会矛盾，为社会安全增加了很多不确定因素；在分配领域，我国当前城乡区域发展和居民收入分配之间的差距较大，且分配制度的不完善导致投机行为、灰色收入等现象较多；在交换领域，当前我国国内市场机制尚不完善，资本市场上投机盛行且风险日趋加大，而在国际贸易方面我国也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倾向等多重挑战；在消费领域，一极是高收入者奢侈浪费的不合理消费，另一极是中低收入者过于保守的储蓄型消费，使得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日益加大。为此，本文拟基于我国经济关系演变的现实特征和理论逻辑，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积极推动我国生产关系的和谐化和智能化发展。生产关系在各经济关系中具有决定性和主导型作用，为此推动我国经济关系的良性转变，必须以生产关系改革为出发点。一是在保障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所有制结构的稳定和良性发展，避免恶性竞争，积极发挥混合所

<sup>①</sup>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8年12月19日。

有制经济的作用，为质量型生产提供保障；二是进一步推进政府、工会、企业等多方参与的协调机制、补偿机制、预警机制等，以加快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三是坚持国家创新发展战略，推进我国在互联网、大数据等高新生产技术方面的自主创新能力，以提升生产关系对智能化生产力发展趋势的适应性。

第二，大力推进我国分配关系的合理化和共享化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关系的改革直接影响到经济主体基于利益最大化所进行的经济决策，为此也是推动我国转向质量型发展的重要环节。一是务必推动收入分配的合理有序发展，尤其是要通过制度完善尽可能缩小由于机会不平等所带来的收入差距，与此同时加强法制化管理以减少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的可能空间；二是依托互联网技术推动共享型分配方式的逐步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我国的必然要求，为此应充分发挥和运用互联网技术，为共享型分配方式提供平台和渠道支持。

第三，着力加强我国交换关系的规范化和共赢化发展。流通领域作为价值实现的环节，对于我国经济关系的转变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且当前我国正面临着充满挑战和复杂性的国内外贸易环境，这就要求必须着力加强我国交换关系的良性发展。一是应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尤其要加强金融市场的规范性，注意防范互联网与金融双重虚拟性结合所带来的叠加风险；二是应坚持互利共赢的国际贸易原则，坚决抵制“新殖民主义”，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措施，成为“逆不平等”<sup>①</sup>的推进者和贡献者。

第四，全面提升我国消费关系的理性化和绿色化发展。所谓“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sup>②</sup>，消费是生产的内在动机和前提，为此推动消费关系的改革对于我国经济关系演变而言有重要的拉动作用。一是应倡导理性的消费观念，既反对不合理的奢侈消费，同时也对过于保守的消费观念予以引导，继而得以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二是应推动绿色消费新格局，“绿色发展”已成为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而绿色的消费需求是推动绿色生产、绿色分配及绿色交换的重要基础，为此应积极倡导绿色消费理念，推动绿色生活、教育和医疗消费等主体内容，并系统加强绿色消费所需的绿色文化、绿色网络、绿色技术等支撑条件。

####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3] 程恩富：《论经济力中的消费力及与消费关系的辩证运动》，《消费经济》1997年第6期。

[4] 徐永平：《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考——马克思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理论的启示》，《理论研究》2011年第5期。

[5] 王朝科：《论经济力的系统结构及其辩证运动》，《海派经济学》2012年第2期。

（编辑：张建功）

① 马艳、李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逆不平等性”分析》，《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2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